宗教艺术

试论民间戏曲对清季四川教案之影响

秦和平

[摘要] 本文依据详实的史料，从戏曲的形式、宣传的内容、演出场地的聚散等因素着手，分析其与四川教案酿生及爆发间的表里关系，揭示戏曲在舆论引导、动员及组织民众等方面的某些作用。分析清统治者对戏曲影响的认识和禁弛的态度，阐述了清末改革川剧的部分原因，消除民教间对峙的某些作法。

〔关键词〕民间戏曲；清季；四川教案

[中图分类号] K25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0）03－0071－06

The Influence of Folk Opera on Anti－ Christian Cases in Sichuan in the Late Qing

Based on reliable historical dat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 propaganda content, and proliferation of performances of Sichuan folk opera,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folk opera and the leadership and outbreak of Anti－Christian cas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opera's function in driving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mobilizing and organizing people. The article also scrutinizes the Qing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 the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of folk opera, and explains some reasons for reform of Sichuan opera, and measures 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to eliminat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lien religion.

一、问题的提出

有清一代，“民教滋事之繁，近惟川省为多；而案情纠缠之繁，亦惟川省为最”①。在观察清季四川历次教案时，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即部分民众或冠以“孔明”、“观音”等名号，或自称“孙悟空”、“黄天霸”、“千岁”、“大王”，等等，积极地充当反对教会的带头人，这些名号既有民间信奉的神祇，更主要是活跃在乡村戏剧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其反教“武器”多系庙宇神像手持之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恒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圈、伏虎圈等”②；从一些反教口号看，不同程度地采用念白的形式。这样的现象促使我们正视和考虑民间戏曲与底层群众运动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教案发生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戏曲与底层民众运动间的依存关系不是我们的发现，早在嘉庆年间，黄育楩就注意到白莲教等秘密宗教与民间戏曲的联系。他说：

“尝观民间演戏，有昆曲班戏，多用《清江引》、《驻云飞》、《黄莺儿》、《白莲池》等种种曲名。今邪教亦用此等曲名，按拍合板，便于歌唱，全与昆腔戏文相似。又观梆子戏腔，多用三字两句、四字一句，名为十字乱谈，今邪经亦三字两句、四字一句，重三复四，杂乱无章，全与梆子腔戏文相似。再查邪经白文，鄙陋

[收稿日期] 2000—03—10
[作者简介] 秦和平（1952－），男，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610041

不堪，恰似戏上发白之语，又似鼓儿词中语。邪经中《哭五更》曲，卷卷皆有，粗俗更甚，又似民间打拾不散、打莲花乐者所唱之语。至于邪经人物，凡古来实有其人而为戏中所常唱者，即为经中所常有；戏中所罕见者，即为经中所不录，间有不见戏中而见于经中者，必古来并无其人，而出于捏造者也。”③

这番言语尽管旨在探讨民间宗教之宣传品（宝卷）与戏曲间的源流与影响，但却道出戏曲与民众运动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透视清季四川社会，戏曲往往起到精神动员、鼓舞斗志、传播影响，以及聚集民众等作用，促成教案的频繁爆发。

二、有关戏曲与四川教案间关系之认识

戏曲属于社会意识形式之一，它以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以典型的事例表现人情世故，以美的感染力触动民众的心灵，“声音感人最深，今之演剧。本倡优俚曲而装点忠孝义烈，出观者流涕，情不尽出于此耳”④，用传统的观念培植人们的情操。是故，戏曲的唱腔念白、人物形象、舞美设计、脚本内容等，往往形成舆论，影响视听，灌输观念，引起一些人的仿效，形成社会行为。“闻上年某伶其于登场演武戏时，所用之双匕首，即今俗称之插子者，实其防身利器。近来外间流氓喜学武派，每带插子，安知不取法于戏剧中。试观连岁以来，戏园或用真军器，而城乡凶器伤人之案亦常见，其故亦可恍然悟矣”⑤。

清代四川，环境闭塞，民众生活单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念单纯，思想封闭，观看戏曲则是多数民众基本的，甚至是惟一的精神生活，沟通认识，宣泄情感，满足感官要求。戏曲这一普及而通俗的文化载体，传授历史知识及道德观念，成为惟一的平民教育工具。“川戏在四川各乡镇人民的脑海里，有非常巩固的地位。乡下八十多岁的老妈可以告诉你许多忠、孝、节、义的故事，使你仰天大笑，使你埋头痛哭。前汉后汉，是是非非，她都说得非常清楚，非常透澈。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从川戏来的”⑥。同时，戏曲亦为民间交流及接触的媒介，沟通和传递各地信息，联系城乡广大民众。各“村邑郭间，筑台竞唱，昼夕不分，盈途喧笑，士女聚观，恬不为怪，迨夕阳人散，犹津津乐道之”⑦。戏台成为社区民众的聚散地、众人视线的关注点、引导动员的场所、公众信息传递的交汇处，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四川民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大小教案屡屡发生。然而，透视一些教案肇因，清楚地凸现戏曲在其中的作用：

首先，戏本的编写及戏曲的演出，譬喻人生，表达民众的意愿与理想，为反对教会提供模仿对象和传播方式。一些人因之效仿，把反教会内容改编为念白形式。文句短小精炼，韵脚音律俱全，琅琅上口，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富于感染，既利于吸收消化，更方便辗转传唱，起到鼓舞民众，动员民众的实效。

如同光之际，四川等地广泛流传反教宣传品《膺戎图》。该图以念白的形式，杜撰李鸿章、鲍超、田兴恕等反教言语，配合绘制的人物形象，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触动接受者的视觉与听觉，烙下深刻的图文表象，影响其思维，支配其行动。其中，“股肱大臣李鸿章判词”曰：“开言怒骂二蛮王，敢来大国乱纲常，尔辈原属犬马类，耶稣老蛮留余殃（原注：大英国蛮王，下同）；劝善为名贿奸党，岂能蒙蔽我忠良（天诛教主臭名耶稣），以下犯上该万死，阴谋诡诈恼上苍；今朝落在我的手（十字架上乱箭鸣呼），蛮子蛮孙刀下亡，从此灭尽天诛教，去邪归正降吉祥（大法国蛮王）。”⑧如此念白，文句简单，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琅琅上口，易于传颂，是快捷而有效的平民宣传品，激发民众情绪，滋生激烈之行动。

当教案爆发后，一些人将反教斗争编为戏曲，辗转传颂，制造舆论，影响视听，鼓舞群众，坚定信心。如光绪十一年（1886）重庆第二次教案后，渝城便有“卖唱之流，名曰打金钱板，编造出伤时歌谣及去岁渝城打毁真原堂并柏果树等处之事，在于城乡镇市四处传播，煽惑乡愚。实属无知妄为，好事滋非，抑且有

伤风化"[9]。岂系无知妄为，实则有意传播，扩大影响，激发行动。

其次，戏曲宣传的忠孝节义观念，是维系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动员或煽惑民众反对教会的精神依据。如，光绪元年（1875），四川各地流传《屉圣主通知》反教宣传品，声称"洋鬼子前次串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又迷串士庶奉汝等的盲教，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朝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敢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自无虚言"[10]。这些内容不乏迷信色彩，言辞也颇狂妄霸道，表现无知的强势，却迎合部分基层民众的口味，动员宣传颇为有效。

再者，戏曲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是部分民众崇拜偶象和模仿对象，是其精神支柱和行动的源泉。他们或名之观音，或自称孙悟空、黄天霸，依附这些神祇及历史人物的名号，模仿其姿势和动作、说白的腔调，以及行走的步伐，幻想藉助其力量，从事反教行动，立下不朽之"英雄"事迹。如光绪后期，大足余栋臣再掀反教斗争时，宣称"吾侪虽非诸葛，尔等当效王朗，本义民实有厚望焉"，道出三国人物对他的影响。

光绪后期，岑春煊在处理红灯教仇教事件后，感叹道："川民笃信鬼神，平日土匪、啯匪、会匪及游惰之民最众，是以今日拥一柔弱女子为观音，便可聚众数千；明日拥以骇稚童子为孔明，又可聚众数百，皆由于失教失养者多，民情复夙称浮动，故易于倡乱若此也"[11]。这番言语透露戏曲在影响、动员民众中的潜在作用，唤起部分人的参与意识，汇成涌动不息的民众运动。

由于戏曲的起源和内容与宗教有着密切之关系，多数戏曲的念白、唱腔和动作宣传的是宗教说教与抗争，演绎人们幻想中的神鬼动作。影响所致，戏曲中英雄人物或神祇使用的道具，被一些人视为具有神力之法宝。一物降一物，用中土之神祇抗衡西洋之上帝，以此教对付彼教。他们除偷窃戏班的道具外，还用寺庙塑像的物品充数。"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置之棚中，认为至宝。凡盗窃神物名曰'盗宝'，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之利，不足惧也"[12]，传递其"以正压邪"的情绪与意向。

更为重要的是，戏曲的演出为民众提供聚集的机会和交流的场所，人头攒动，群雄聚集，躁动的人心受到情景的感染，处于亢烈与兴奋之中，易生仿效行为。倘若此时有相关舆论的引导或煽惑，交相感染，情绪激愤，便易滋生事端。更因当时四川戏曲多系庙会、宗族、乡场或帮会承办，露天演出，时间多达数日，向例不收门票，前来观看的民众多、流动大、成分复杂，信息的传递幅射远，影响深，民众的情绪和行为颇难控制。

情节的感染、流言的传播，以及演出期间的聚散流动，使得一些民教矛盾尖锐的地点每逢演戏时节往往是教案的多发期。典型者如大足龙水镇，此地曾连续发生5次教案。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忽视戏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办案官员桂天培曾总结："以龙水镇之连年赛神迭酿祸端者，皆由远近痞匪集赌为奸，借进香之众面涂红黑，结队成群，造谣生事。种种恶习，诚非敬神邀福之道，而实因会为乱者也"[13]。换言之，神会需要演戏，演戏引起民众聚集，聚集触发骚动，骚动酿生教案，形成特殊的连锁关系。

或许有人会问，戏曲演出各省皆有，为何其他省份不因此酿生教案呢？据我们所知，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在山东兴起，某些诱因亦与戏曲有直接或间接之联系[14]。如此看来，酿生四川教案的肇因并非个案，带有共性。再者，四川戏曲脚本内容较为粗俗，表现形式较为显露，其演出场地是露天的，依靠震耳欲聋的大锣大鼓演奏及声调高亢的高腔等来吸引、留住观众。"雅"显不足，"俗"颇多多，比较适应底层民众这一观赏层次，其影响与效果往往与其口味要求呈现互动。是故，戏曲塑造的人物形象容易在底层产生共鸣，得到认同和效仿，起到动员之实效，酿成群众性的反对行为。

三、清末四川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与相关作法

由于戏曲是最有效的大众传媒工具，其

内容产生正面或负面之影响，甚至左右一些人的言行；演出场地成为民间联络媒介，囤聚四方人群，容易诱发群体行为。因之，在一些民教矛盾尖锐之地点，戏曲往往起到诱导或催化之作用，煽动或激发民众情绪，不能自已，难以自控，酿生冲突。

教案之后，在分析肇因时，一些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戏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为防止教案的再度爆发，不免采取查禁这一简单方式。如光绪末年崇庆知州柴作舟禀报总督岑春煊，请求查禁戏曲，将骚乱压抑在萌芽状态中。他说："缘邪说如《水浒》、《三匣剑》、《绿牡丹》等书，所言皆好勇斗狠、犯上作乱之事；茶馆所讲评书亦无非此等事。读者、听者尤而效之，遂自目无法纪，故开盗智；即今之拳匪，亦此等书有以惑之也……至于治盗而禁及演戏，似属迂阔，言谈不近情理。不知川省戏价本贱，无论城乡会戏一开，经旬累月，百里内之来观者盈千累百，良匪混杂，皆以看戏为名，兵差无从稽查，团保亦难盘诘，盗匪成群，结党混迹其间，同谋不法，比比皆是。其盗薮州县，则戏场内匪类麇集，刀枪林立，更无人敢于过问。因此而匪党日多，匪风日炽，其传染迄无休息，以故戏场近处，或城或乡之被抢劫被捉赎者不知凡几！至若观戏者废时失业，有碍生计，演唱淫戏败坏风俗，犹其害之尤大者耳。"[15]类似的建议，在一些官吏中也有反映。

然而，用禁止方式防范教案等的发生过于简单粗暴，矫枉过正，弊大于利；即或能奏效一时，亦难长久地坚持。事实上，民众在物质生活之外，也需要感官和心理上的宣泄，培植向往和仿效对象，聚散或交流，沟通情感；统治者也欲借戏曲的教化作用，引导民众服从和认同，因之戏曲存在较大的社会需要，有需要就会有演出。更由于戏曲的演出往往与庙会、帮会、家族聚会及民间节目等相联系，禁止演戏既会引起地方势力的不满，也会连带屠宰、营业税厘的征收，影响财政收入，给捉襟见肘的地方经济雪上加霜。是故，时人评论"戏场安养苦人多，行政要须令不苛；但禁淫邪崇节义，噎时废食较云何。"[16]

光绪后期，锡良、赵尔巽等大吏先后督川，正视戏曲在影响民众观念、支配其言行中的潜在作用，意识到禁止戏曲作法的近视错误，发出"正心厚俗，非改良戏曲不为功"[17]的感叹。

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清统治者采取加强管理的作法。一则是将戏曲引入戏园演出，划地为园，集中管理，观戏收费，限制观众。二则是删除一些戏目，改编若干戏本，注入有关的内容，正人心，维风气，行教化，使之既能符合当地官府维护统治秩序的要求，又能迎合群众的精神需要，降低甚至消除戏曲的负面影响[18]。三则清理一些戏目，禁止演出，对那些不听从禁令，继续上演某些内容剧目的戏班实施严厉的惩罚，以儆其余，规范行为。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燕乐班在成都川主宫内上演禁戏《晋阳楼》等，被人告发，戏班头被地方警察局传唤，被处以枷号并押至戏场示众。通过这类典型案例，教育其他戏班。"经此惩责之后，梨园子弟当不敢弁髦禁令，有益于社会不少矣"[19]。凡此种种，激生清末四川戏曲的改良运动，并伴随立宪运动的开展而达到高潮。

宣统元年九月（1909.10），四川省咨议局召开第一次议事会，众议员针对底层民众既不能进校学习，又无家庭教育之引导，易受小说、戏曲、宣讲、僧道伪造经书之影响，启人迷信，积之又久，致有义和团，红灯教之结果，屡酿教案之现象，建议成立通俗教育社，根据时势之需要，着手进行改良小说、戏本和宣讲书等项工作，启迪民智，防患未然，阻止教案的发生。并为此提议，声称"戏曲感人最深，川省戏曲恶劣已极，人戏除诲淫外，每杂以会匪旨趣，而美以英雄豪杰之名。影戏多演《西游》、《封神》等书，农夫俗子容易蛊惑，以故壬寅（原注：川西南红灯教，下同）、戊申（开县红灯教）之乱，多出于乡民。刻梧花教又见告矣，尚未得最后之报告……宣讲生（指旧日者言）每于晚间作传谕、降鸾、下阴曹、打神拳等狡狯伎俩，说神说鬼，愚人骗钱，不特为拳教之影响，而且有拳教之事实。一遇民教交涉或凶年饥岁，遂至激为大变。类于此者，如巫觋之捉寒林、放五猖、拿生魂、抓生替死、踹刀、穿铧，此等邪术最足惑人。

符咒医人，意原不恶，而前年开邑之红灯教即以符水戒烟愚人，故从之者众，而起事最速。种种恶俗，大致不出怪力乱神四字，是非仍从通俗教育着手，改良小说、戏曲、宣讲等类，不足以遏乱源。然后一面以白话报章、白话普通教科书输入新知识，俾庸夫俗子渐受文明教育，不致阻挠新政、防害治安。知识渐开，理想渐明，道德生计均于此出"。经过一番辩论，议会同意立案，决议由提学司、巡警道等在省城创建通俗教育杜，为全省之倡导，进行发行白话报纸，改良宣讲书本和戏曲唱本，编译新小说，以及批评改正旧小说等项的工作。[21]

接着，清政府在成都成立改良戏曲会，由黄级三负责，广泛征集意见，选择改良形式与内容，加快改良之进程。如州判朱金圃向赵尔巽呈上条陈，建议改良工作重在戏本。其核心是教忠君，进行爱国尽职、保孤死战等教育；教齐家，鼓励孝亲友悌、观妻训子、督婢课仆等；教完节，保留殉夫课子、骂贼瞒亲、礼解智脱等戏本；教守义，宣传信友抚孤、却婿辞贿、忠主赴难等内容；并且，力戒淫污、急破迷信、语禁齐语、仍用川腔。在操作方式上，"翻新而不必尽因旧，原国民各有特想"，适应不同层面群体的需要；"袪俗而不可过舞文，庶老妪都解佳音"，通俗易懂，扩大戏曲的教化面；"限日传名优，听编者口讲指画"，注重对演员的教育，提高素质，加深戏本的理解；"设报宣本旨，使阅者悉心旷神移"，将一些社会问题编成戏本，刊载报章，广泛传阅，扩大影响，"广训国民之戏科书，其庶几可补学堂之罅漏"，与学校教育相得益彰，等等。[21]

在改良戏曲的同时，清统治者也广泛利用其宣讲形式，撰写通俗宣传品，启发民智，认识时代的变化，协调民教关系，防范教案的发生。如宣统元年（1909），安县等地发生红灯教反教斗争，赵尔巽将反教首领肖应典、李开方二人拍照后正法，并配合照片的张贴，撰写《劝民醒迷歌》等宣讲告示，申说反教恶果，要求重视学习，提高认识。"皆因你等不读书，自家心内乱腾腾；皆因你等不看报，现在时势不知道；皆因你家无教训，从小放纵没营生；皆因交往无正人，满口胡柴没正经；皆因懒惰受穷困，要想横财心不平；一听邪话便入耳，一学邪事便胡行；家邪自然招外鬼，物必先腐复虫生"[22]，等等。

其间，各属政府还在小学教材中编撰相关的内容，置入课堂教育之中，从娃娃抓起，培养其观察鉴别能力，正视并接受教会的存在，协调民教间关系；并通过孩子之言行灌输家长，影响社会，形成合力效应。如，《涪州小学乡土地理》"仇教之害"课文中说："西人传教，国家许为保护。从前每因民教积嫌，匪徒乘机鼓煽，妄称教堂有残孩挖目之事，乃劫物焚堂，酿成巨祸。终至损一赔十，首祸者置诸重典，不特丧身破家，且牵动大局，贻君父之祸……年来风气渐开，尚无一切暴行，尤望互相告诫，驯至畦町悉融，益见中外辑和之效也。"[23]课本内容与戏曲宣传相互配合，互为表里，通过学生之言行，影响家庭，制约社会。

既然戏曲这一传煤在影响观念、动员民众反对教会、酿生教案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之作用。要消除其中的负面影响，亦需要运用戏曲这一传媒形式，引导舆论，教育社会，辑和中外。本世纪初，四川大吏利用新春元旦等节日，藉戏曲为媒介，进行联谊活动，延请在川中外嘉宾，包括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人士观看，既联系感情，增进友谊；更示意社会民众，作融合之导向。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慈禧太后生日庆典，锡良藉此组织演出，宴请在川外籍人士，敦睦中外友谊。其时，川西北教区主教杜昂（Danand Marie julien）因故未能参与，特别致函相关官员，表示歉意。函云：

> 迳启者　本月初十日系皇太后万寿圣节，承大帅厚意，特邀敝主教前往与宴。本应届期往贺，奈有不得已之苦衷，不敢直达于大帅台前，谨为阁下陈之：一则以是日有演戏之举，依敝教之规，不便参观；一则以敝主教年近古稀，精力衰疲，不耐应酬。为此函恳大帅前善为关说，俾得原谅一切。惟冀皇太后万寿无疆，永享升平，则敝主教所深祝者也。[24]

观看戏曲的邀请虽被教会善意拒绝，但它表明积极的信号，即四川大吏重视戏曲之作用，在着手改良的同时，藉此对外交流，消除隔阂，示意民间，引导舆论，消除乱萌，预防

教案的滋生或发展。

当然，戏曲的改良、教育的普及等，启发了民众觉悟，其言行趋于理性，民教间的隔阂得到部分消释，更为重要地是，辛亥革命后，民众思想有了进一步提高，对教会的认识也较为科学公正。“国体更新，此弊寝革，民智日进，罕为所愚”。[25]此后，因戏曲酿生教案之现象亦因之不复存在。

---

①（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

②⑫陈世虞等：《犍为县志》卷十四及卷四，1937年铅印本。

③黄育楩：《破邪详辨》（《清史资料》）卷三，第5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㉓贺宗典等：《涪州小学乡土地理》（《涪乘启新》）卷三，第24课，第39课，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⑤傅崇矩：《成都通览》第279页，巴蜀书杜，1987年。

⑥李光绩：《从川戏看四川社会》，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未刊原稿，1945年。

⑦戴德源：《四川戏曲史料》第77页，成都市川剧志编辑部等编印，无年月。

⑧《教务教案档》，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国师克勤递交总理衙门函文。

⑨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⑩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84页，齐鲁书社，1986年。

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下，第7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⑬《教务教案档》，光绪十七年九月初二日成都将军歧元致总理衙门函文中所附桂天培办理大足教案禀文。

⑭周锡瑞（J.W，Esherick）著、张俊义等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⑮《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777页。

⑯王增琪：《聊园诗存再续》卷十，第12页，光绪末年刻本。

⑰㉑朱金圃：《川边政屑》第53一58页，1915年铅印本。

⑱周洵：《芙蓉话旧录》第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⑲《成都日报》第268号（先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⑳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第62－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宣统二年四川总督部堂赵劝民醒迷歌，未刊原件。

㉔同上，光绪三十三年天主教川西北主教致四川洋务局官员函。

㉕李凌霄等：《南溪县志》卷四，1937年铅印本。